

# 哈佛新校长就职演讲—— 高等教育三大核心价值

■郭英剑

10月5日,哈佛校园内彩旗林立,人头攒动,笑声阵阵。哈佛大学历史上第29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于下午2点在三百周年广场举行。哈佛师生、校友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数千嘉宾参加这一盛会。

哈佛新任校长巴科携夫人参加典礼。作为哈佛的毕业生,他把自己的三位导师也邀请到了现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之前的四位校长与会,分别是福斯特校长、萨默斯校长、鲁登斯坦校长与伯克校长。五位校长同台出场,成为当日的一大景观。据哈佛校报报道,这是哈佛将近400年历史上,第二次有五位校长同台聚会。上一次五位校长同台出现,已经是距今将近160年前的1861年了。

下午2点,嘉宾入场。2点30分,就职仪式正式开始。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夫、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尔等校外嘉宾分别致辞。哈佛在校生、美国青年桂冠诗人艾尔曼在典礼上朗诵了自己专门为此次盛会创作的诗歌《奔跑中,我们创造奇迹》。

## 当代困境:高等教育究竟有无价值

就职典礼仪式是新校长展示自我的舞台。发表演讲、阐发个人执政理念,自然是典礼的重头戏,也是众人期盼的时刻。

巴科的演讲谦逊低调,但直奔主题。他观点鲜明,步步推进,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他从人们在哈佛总是学有所得开始讲起,提到自己从家人和他人身上所学到的一切,才成就了自己的今天。他感谢家人、老师、前任校长、哈佛师生所给予自己的关爱、良好的教育、提供的机遇。他不忘提到那些前任校长中引发争议的一些行为所带给自己的警醒。他以自己能够担任这所全美最古老的大学校长为荣,但也直言不讳,在当今时代,身为一校之长并非易事。接着话锋一转,指出当下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

巴科说,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极富挑战的时代。就个人而言,自己生平第一次看到,人们真切地怀疑把孩子送进大学的价值所在;人们真心在追问高校是否应该获得公众的支持;人们真实质疑高校之于国家的真正贡献。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汇成了一句: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和人民所

## 记者快评

# 「学生官」背后的定位困惑

■陈彬

国庆前后,“学生会”与“官僚主义”这两个本不应该有关联的词语,再一次被联系在一起。在成都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社团QQ群内,某学生因为直接@学生会主席詢問问题并以“学长”称呼对方,被两位学生干部教育并辱骂,另有学生表示,学生干部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

此事被公开后,又有网友爆料,某校一位社团成员因写错部长/主席名字,被要求抄写50遍,还要“开大会检查”,另有学生把社团要求给部长/主席发“节日祝福”的消息截图发到贴吧,被社团成员找上门要求道歉、追责。

针对频频爆出的各种“学生官”事件,10月6日,国内数十所高校联合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公约要求各校学生会反对“官”本位思想作风,打造一支优秀的工作骨干队伍。这样的自律公约当然是好事,但仅仅依靠一纸公约,就想扭转积存已久的学生会官僚化倾向,似乎并不现实。因为这一问题虽然出现在学生群体中,但其根源却远不是几个学生想送一筐“官威”这样简单。

我国的学生会制度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初。1919年12月,在五卅运动初期,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学生会。成立初期,清华学生会的组织形式模糊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即“三权鼎立”。评议会是全校代议机构,行使立法权;干事部行使行政权;司法的权力还掌握在学校教务处于中。此后,学生会的组织形式虽有变化,但始终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目前,国内高校学生会被定义为“学生自治组织”,其中的“治”是“治理”之意。换言之,目前的学生会对于学生而言,是一个具有“治理”功能的“上级机构”,这一定位其实就已经先天为官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加之目前某些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学生组织中想不出现某些官僚化的苗头都难。

有意思的是,在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学生会条例中,都会明文规定“服务学生”的条款,而无论是学生会本身的宣传,还是在一般学生的认知中,学生会都需要为学生提供服务。于是,这便出现了围绕学生会的定位困惑——学生会究竟是管理机构,还是服务机构?在笔者看来,面对当前的“90后”乃至“00后”学生,学生会的主要功能应该是为下服务学生,对上向校方表达学生意见。从这一角度来说,学生会本身应该慢慢转变自身“治理机构”的定位,这样转变的也是学生会官僚化出现的根源。当然,这样转变也不是学生群体自身能够做到的,也正因此,面对近期频繁出现的“学生官”事件,真正应该反思并采取行动的,反倒应该是高校本身。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作出的贡献到底体现在哪里?

在简要回顾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之于美国的重大贡献之后,巴科重点阐发了他个人对于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三大作用的理解。他以哈佛为例,指出以哈佛为代表的大学所有大学的精髓,就在于其所代表的三大核心价值,即真理、卓越与机遇。

巴科说,当今世界,我们既要更加充分地体现真理、卓越与机遇,也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加以辩护。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批评,而是因为这样的价值是确保美国伟大的基石。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他逐一分析了真理、卓越与机遇的价值所在。

## 追逐真理需要勇气

巴科提出,在一个技术消融了中介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针对任何事件随时随地发表个人看法。而在这样的时代,各种媒介都在竭力区分哪些是人们的观点,哪些是事实。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结果就是谣言四起,幻想难分真假,情绪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把理智完全抛在了脑后或是罔顾现实。

巴科为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假如在今天我们依旧需要批判性思维,需要在喧闹中找到方向,那么,广泛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从未显得如此重要。“教育学生在各类新闻与观点面前成为有辨别能力的人,还要他们成为真理的来源与智慧的化身,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这里,他特意将“我们的”这个词用斜体字标出,以此强调作为教师与管理者的责任所在。

巴科说,“事实”与“真理”两者有区别。“事实”无可争议,或者至少不应该有争议,而真理则是需要人们去发现,体现在人们的争论与尝试之中,要经得起对立面反驳与对立观点的考验才能获得。”巴科说,“这恰恰是一所伟大大学的功能所在,学者们在此争论不休,还要出示各种证据以支持各自的理论学说,其目的就是要努力去理解这个世界,阐释这个世界。”

在巴科看来,这就是探求真理的过程。而探索

## 域外传真

# 教学质量不应用毕业生薪酬衡量

■多米尼克·谢兰德

这样的改变计划令人担忧,是超出预料和非常不公正的。毕业生收入这样充满争议、不确定的数据,原本是用来将大学毕业生薪水与其所学专业和在大学进行对比衡量的,而非教学质量。

毕业生收入并不能够准确反映一所大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是衡量大学学位附加价值的标准。它实际上是反映地区劳动市场、就业形势,以及毕业生社会经济背景的数据。

政府近期发布的产业战略白皮书中,强调了大学在支持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将毕业生收入作为教学卓越框架的衡量指标,无疑会加剧地方面的不平衡。位于伦敦和东南部的高等教育机构和院校

# 取消“清考”须改革教师考核机制

■本报见习记者 程唯珈 记者 甘晓

学生不愿意听的课程。一名本科学生小宇(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大家所谓的“水课”主要是学校的一些公共课,很多同学认为和专业不相关,干货很少,所以没什么价值。

本科毕业论文也是此次《通知》下令狠抓的重点。在老师们看来,抄袭的现象最为普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湛所执教的“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系列讲座”课程中,22位学生期末作品因抄袭均判零分。“我必须严厉对待,不能对抄袭行为姑息纵容。”

无论如何,“狠抓”各项措施的责任,最终会落到大学教师们的肩上。接受采访时,老师们倾吐了苦衷——不是不想严,而是没精力。

“以论文、职称、‘帽子’为导向的考核机制,让很多大学教师根本不是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来做科研,更不用提教学了。”四川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不同级别的教师待遇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拿到国家各类人才计划的教师,不但职称提高,薪水更是增加了几倍。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龚庆杰回忆起自己的学生生涯:“28年前我在中

国的伟大依赖于这种对于卓越的不懈追求之中,同时,支持高校校园内的卓越追求,并不与社会中自我感觉不被关照甚至是掉了队的人们的利益相背离。在大学中,学者们都意识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收入不平衡,社会流动性在下降等现象,并对此提出了警告,他们的观点有助于社会朝着公平迈进。

巴科说,所有领域中的研究都能产生新知识,新的联结,以及对人类有新认识的真相灼灼。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生命因何而来,同时更要了解生活的意义何在。既要探究我们何以作为人类的分子密码,同时也要探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何以具有人性的文化内涵。

巴科说,将来有一天,当机器时代消失的时候,人们还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马尔克斯,还要继续聆听莫扎特、鲍勃·迪伦,也还会继续思考激发哲学家和诗人上千年的那些问题。何以如此?因为正是我们的艺术、文学、音乐、建筑,恰恰是人类努力前行中最为永恒的作品。作为全美最古老的大学,哈佛肩负着更为特殊的责任,要去捍卫人类的这一智性传统,正是这一传统,定义了自文明诞生以来的知识一代。

为此,教师们不是单单向学生传播一种知识体系,而是要拓展他们的人性,教给青年人如何欣赏艺术、社会与自然之美,还要帮助他们去发现,人生值得去认真度过的原因究竟何在。

## 高校要成为机遇的代名词

巴科说,所有高校,无论公立还是私立,无疑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为此,每个人都要牢记为社会服务的集体责任;同时,也要教育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回报社会。为此,他希望所有的哈佛毕业生都能成为积极参与、开明进取与付诸行动的公民。在巴科看来,这实际上是学生们认识更为广阔的天地,去发现用自己的潜能改变世界的绝好机遇。

巴科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只从社会的某个小角落挖掘人才,那我们就很难达到卓越的境界。高等院校就必须要去寻找机遇,成为机遇的代名词。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为最有雄心壮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使他们在经济还是社会领域中都能够出人头地。今天,我们要保障高等教育能够继续并持续发挥这样的功用。

巴科特别提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不断地告知我们的下一代,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要让他们铭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他们想去走前列,教育能够把他们带向理想之地。高校使很多人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为此,教师们也有责任去维护并让后来人同样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在演讲的最后,巴科总结道:“我希望在高等教育界的人们都能遵从基本价值观——真理、卓越与机遇。不仅如此,还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这样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是使国家和世界的未来,能够比今天更美好。”

巴科的正式走上任,预示着哈佛大学翻开了新的篇章,一所古老的大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会更具优势,因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劳动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收入最高。

除此之外,将毕业生收入作为教学卓越框架的衡量指标,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很多大学在招生时,都倾向于招收没有劣势背景的学生。而毕业生的年龄、家庭状况、社会经济背景、性别、种族等,都会影响毕业生的收入。与此同时,对于如产科、护理等毕业生收入一贯低的专业来说,又该如何应对呢?

因此,如果学生事务办公室想要准确反映各大学的教学质量,那么他们应该反对将毕业生收入纳入衡量标准。

(作者系德蒙福特大学校长,许悦编译)

地质大学读书,教师们很敬业,跟学生接触也较多,类似师长与朋友的双重关系。”

然而,今天的大学老师反而做不到。刚刚走上大学讲台的年轻教师王辰(化名)尽管很想全身心投入教学、对学生严格要求,但是面对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他自觉难以把好教学质量关。

“教授们天天出差见不到人,更别提带本科生上课,如果就是我们这些小讲师玩得地教课。”王辰说,“如果同时想要评上副教授,还要拼命去弄项目和写论文。”

一边是上不完的课,一边是严格考核的科研成果,像王辰一样的年轻讲师只好降低教学上的要求,“水课”产生了,抄袭也就有了,只有靠“清考”让学生毕业。因此,大学老师们认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应从改革大学教师考核机制做起。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亮也表示:“本科教育现状实质上与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偏向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目前高校普遍重视科研,评定职称、荣誉、帽子等都是与科研关联在一起。”在教学上扎扎实实投入的群众在现有的考核机制下可能“挨累不讨好”,长此以往也会失去教书的动力。

## 高教观点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名取校”的惯性思维,人们普遍认为,校名称大学的质量高于校名称学院的,校名称学院的质量高于校名称专科学校的,学术型高等学校的质量高于应用型(职业)型高校,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高校更名热潮。其实,这是社会和高校对高质量发展发展的片面认识与盲目行动。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目标的适切性,及其与办学效果的一致性,即高校办学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其办学层次提升和类型转变,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发展不能混同的问题。

今年5月,教育部公示了包括19所新设本科院校、16所更名大学、3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院校和2所同层次更名院校的40所高校名单。近年来,高校更名不断引发社会舆论的质疑,教育部曾就此发过声明:从未发布过更名通知而是设置名单。教育部发声没有问题,而批准设置的高校都更换了校名也是事实。就是说,社会舆论把设置解读为更名也没有错,因为更名就是设置的内容之一。对此,有网友直言,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面对高校更名,无论是教育部的声明,还是社会舆论的质疑,各方既各有其理也都不全在理。理清高校更名,还是设置文字游戏背后的是非曲直,还需要我们理性地分析。

我国高校以设置的名义而更名,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始建于晚清的旧式学堂(高等学校),在洋务运动兴起时则改名为大学,如上海圣约翰书院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校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多次更名热潮。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旧院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1952年的院系调整;第二次是在国内教育大震荡时期,1958年“大跃进”与1966年“文革”以及1978年恢复和增设一批高等学校;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期,通过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和划转等方式改变了众多高校的隶属关系;第四次是从新世纪开始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时期,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提升层次或改变类型。

事实上,高校更名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专门谈论高校更名现象——“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贸易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尽管福塞尔描绘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照当下的中国高校更名也同样适用。社会舆论对更名多有质疑:一是贪大求高的不良风气,即校名越改越大,层次越改越高;二是希望通过更名来提升办学地位,本质上纯粹是攀比心理在作祟;三是形式主义的恣意蔓延,即优良传统和特色的丢失影响到长远发展;四是“离经叛道”的教育行为,即一定程度上不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等。

校名作为高校承载厚重学校文化和精神的符号之一,不仅能给社会传递办学特色的信息,也能给社会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提升社会对学校的认同。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高校,其校名还承载历史、彰显传统、寄托情感、激励师生。倘若随意更改校名,不仅是对师生的不尊重,也是对优良传统的漠视。换言之,一所学校的校名是该校的招牌与标签,是否要更名一定要慎重之又慎,除非必需,一般都不要轻易更改。具体分析我国高校更名的原因可见——既有社会发展引发的高校必须更名、高校实行分级管理引发的争取更名,以及高校发展壮大引发的自然更名,还有高校争“名分”引发的更名异化。

新时代要遏制埋藏着高质量发展隐患的更名异化现象。因为它扰乱了高等教育结构,即高等教育类型与层次结构失衡,以及高等学校办学目标模糊不清;也不利于高等学校“形象提升”,即校名包含着丰厚的历史沉淀和人文价值,更名会有一定的品牌损失;也进一步助推了浮躁之风,即更名暴露了办学浮躁与精神贫乏;更为严重的是,与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全球知名院校,按照我国高等学校更名的做法,早就该更名为“麻省大学”了。可是,麻省理工学院始终不改校名也没有影响其誉满全球。我国也有如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一些老资格的“学院”值得点赞,他们在更名热潮中得住寂寞,坚守着自己的金字招牌。

十九大强调“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应科学认识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扬弃仅把提升层次和转变类型的更名作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全面谋划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战略,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等教育。(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 高校更名的 高质量发展 发展隐忧

■刘尧